

李宗江 著

汉语

常用词演变

研究

H A N Y U

C H A N G Y O N G C I

Y A N B I A N

Y A N J I U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李宗江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纪大庆

装帧设计：钱自成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李宗江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8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ISBN7—5432—0369—3/H·140

定价：19.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建院五十周年！

前 言

加强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这是近年来不少先生所提倡的,这方面也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总的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是汉语史研究领域里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本书集中了近几年来我在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方面所作的全部思考,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专题讨论,谈了8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举例性的,之所以选择这几个题目来写,是因为我在这些方面有过一些思索,想发表一点看法。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所应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以及精密的叙述体例。这样的写法缺少系统性,但倒也自由洒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甚至还写上了自己的疑问和困惑以及一些可能是很幼稚的想法。后面一部分是1994年以来写的10篇论文,多数是曾经发表过的,收入本书时又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些文章都不长,集中地讨论几个词的演变。要把几个词在几千年中的演变问题说清楚,显然不是万把字的短文能够完成的,每个题目都写成一本书也不为过。现在这样的篇幅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告诉读者我在有限的语料中发现了什么。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向学术界的同道们说明,我有志于进行汉语常用词演变问题的研究,并将自己曾做过的一些事情报告给大家。至于这些事情做得怎么样,就只有等专

家们来批评了。

按理说,我并不具备资格来谈论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学现代汉语的,后来也一直是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研究的兴趣主要在语法方面。在学习和研究汉语语法的过程中,遵照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的教导,经常要去查一查某一语法现象的历史。对一个句式或一个虚词,要考察它的历史,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看它的来源,一个是看它所替代的历史上的同功能形式。这第二个角度所涉及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1994年我写了《“V得(不得)”与“V得了(不了)”》一文,讨论了两个句法格式的演变,涉及到了这两个格式之间的历史交替问题,并将这种交替称为“历时替换”,从此我才真正开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这项研究在选题之初就得到过陆俭明先生的指导以及方梅、张伯江两位师兄的支持。后来我先后参加了新时期语法学者学术研讨会(武汉)、首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成都)、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北京)、第七届国外语言学研讨会(洛阳)、全国第八次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开封)等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过本书个案研究的有关内容,得到了张永言、向熹、曹广顺、汪维辉、方一新、徐时仪等位先生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汪维辉、方一新、徐时仪等几位先生都在出版前就看到了本书的内容,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使得书中的不少疏漏和错误得以避免。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以上给过我指导和帮助的先生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中我引用了很多学者的材料或观点,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谢意。书中引到他人的看法,并不表示我都同意这些看法,只是说明可以或有人从这些方面来讨论有关的问题。如果在涉及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时有引错或理解有误的地方,由我负责,并提前在这里向有关的学者道歉。

作者 1999年3月

目 录

专题讨论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	(1)
衍生性演变·····	(8)
交替性演变·····	(26)
常用词演变的原因·····	(36)
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	(57)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方法·····	(69)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	(89)
常用词演变问题存疑·····	(103)

个案研究

“V 得(不得)”与“V 得了(不了)”(1994) ·····	(110)
《红楼梦》中的“与”和“给”(1996)·····	(124)
“即、便、就”的历时关系(1997a) ·····	(139)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1997b) ·····	(151)
“也”的来源及其对“亦”的历时替换(1997c) ·····	(164)
汉语总括副词的来源和演变(1998a) ·····	(179)

汉语“才”类副词的演变(1998b)	(196)
汉语“还”类副词的演变(1998c)	(220)
汉语限制副词的演变(1998d)	(240)
关于《“进”对“入”的历时替换》的几个问题 ——答董志翘先生(1998e)	(262)
参考文献	(269)
语料文献	(283)

专 题 讨 论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

(一) 关于词汇演变。讨论词汇演变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讨论一个词怎样变生出另外一个词。这又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这个词在两个义位上读音(有时包括文字形式)发生了分化，有时词类也发生了转化。如由“长”到“胀”读音和字形都变了。“衣”由“上衣”演变出“穿着”，这两个意义不但读音不同，而且词性也不同，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第二，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这个词在两个义位上读音和字形都不发生分化，只是词类发生了转化，如“餐”由动词义的“吃饭”变为名词义的“饭食”。第三，是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仅是增加了一个义位，读音和词类都不发生分化。在词典上，一般把第一种情况的两个义位看作两个不同的词，即演变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词；而把第二、第三这两种情况仅仅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义，不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词，这是因为编词典着眼于几个意义之间的联系。但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情况都可以看作是产生了新词。因为一个词多了一个义位，就在词汇系统中多了一重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也就等于产生了一个新词，原有的语音形式带着这个义位以一个词的身份参与

新的聚合内成员的历时替换。例如“亡”在“丢失”这个义位上，与“失”构成同义聚合关系，与“得”构成反义聚合关系，与指物名词构成组合关系，如“亡羊补牢”。在“灭亡”这个义位上，与“灭”、“废”等构成同义聚合关系，与“存”、“兴”等构成反义聚合关系，与表示“国家、政权、军队、民族”等等的名词构成组合关系，如“亡国”。所以在下文的讨论中对词和义位不作区分，只要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就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词，不管语音是否分化，也不管词性是否转类。我们管这种从甲词变生出乙词的词汇演变叫“衍生性演变”，管甲词叫“源词”（需要时也称为“源义位”），管乙词叫“新词”（需要时也称为“新义位”）。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词汇成员的新增旧减以及新旧词语的历史交替。我们管这种意义上的词汇演变叫“交替性演变”。本书着重讨论交替性演变问题，下文再提到词汇演变时，只要不作说明，一律指交替性演变而言。由于讨论交替性演变离不开衍生性演变，因为在交替性演变中要讨论新词的产生，而新词的产生主要是衍生性演变的结果，^①所以也将涉及衍生性演变的类型及相关问题。^②

（二）关于常用词。研究词汇的演变，没必要也不可能把从古到今所有的汉语词都拿来进行研究，需要划定一个词汇范围，假定这个划定范围内词汇的演变可以代表汉语整个词汇系统的演变。划定的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怎么界定？我们遵从张永言（1995）和蒋绍愚（1989a、1994a）二位先生的意见，叫“常用词”。实际上这里所指的“常用词”，既不同于一般以词频统计为依据确定的常用词，也不同于词汇学中的基本词汇的概念。本书所指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上的常用词首

先是作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疑难词语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指对研究词汇演变有重要价值，具体说是指那些代表词汇的核心而其发展变化可以决定词汇发展面貌的词。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常用词作出内涵方面的界定：

1. 这类词的所指与人类自身以及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2. 这类词的能指，包括语音和文字形式曾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过变化。

从外延方面说，常用词的范围以下面所列为主：

1. 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和副词。虚词的演变既是语法史研究的对象，也是词汇史研究的对象。过去对虚词的研究主要是语法史方面的，以虚词来源和用法的研究成果最多。特别是近代产生而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虚词的来源和发展，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研究。但是表示同一种语法关系的虚词在历史上的消长交替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副词，从词汇演变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当薄弱。副词的整体功能较为单一，但意义和用法上个性很强，词义抽象，而且究其来源与实词特别是与动词和形容词关系密切；考其发展，又可能变为其他类虚词，如变为连接词。另外通过词义引申而产生其他副词的情况也很复杂，因此副词在常用词演变研究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

2. 代词。代词这一类从语法史角度研究得比较多，包括代词在近代演变的研究做得相当出色，有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和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等集大成的著作。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这三大类中的主要成员在古代

和近代变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大致上是清楚的。但从词汇史的角度,将不同时期的代词联系起来,通过较为可靠的接近口语的语料,来描述新旧词的消长替换过程,说明新旧词交替的原因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疑问代词“几”从古到今一直在使用,但先秦就存在的“几何”,后来的“几许”、“几多”、“多少”等双音节代词之间在演变上是什么关系,还不是非常清楚。^③再如古代的“如何”、“何如”、“奈何”与“怎样”、“怎么”等是怎样交替的?都值得研究。

3. 量词。一般认为汉语量词中名量词与动量词的产生不同步(王力1980,244页;潘允中1982,120页)。动量词的古今变化较小,主要是名量词的变化大,其中重点是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介乎于实词和虚词之间,封闭、定位,词汇意义抽象,主要起数名组合的中介作用,是汉语特点的表现之一。个体量词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一般化,对名词的选择性变小,如“个、只、件”等。但也不尽然,如“枚”在中古是个结合面较广的量词,类似于后来的“个”,一开始只作为树的单位,后来泛化为指一般事物(包括动物)的单位,对名词的选择性很小(张万起1998)。再如“头”,原来“龟、雀、鸟、鼠、兔、鱼”等动物都可论“头”(潘允中1982,113—115页)。“枚”和“头”在现代汉语中搭配范围都缩小了。量词的搭配范围扩大,这好理解,词义泛化是一般词义虚化的规律。但范围缩小是什么原因呢?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古今变化也不小,总的发展趋势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实物为单位的逐渐减少,国际通行性增加。总之对量词演变的研究还不够。个体量词多由名词发展而来,名词演变为量词的过程怎样,汉语量词作为一个词汇语法范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如把汉语词

汇发展的历史划开若干平面,在每个平面上都有哪些量词,两个平面量词的继承关系如何?都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4. 名词。名词中较有研究价值的是表示以下语义内容的词:方位、时间、处所、人体器官、亲属称谓、动植物(主要是家畜、家禽及农作物)名称、房屋建筑、日常生活器具、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有的名词古今变化很少,如表自然现象、地理现象的名词;有的词古今所指难以比较,如表示职官、行政区划、军队建制、宗教事物以及表示古代哲学范畴的名词如“阴、阳、虚、实、道”等可排除在外。

5. 动词。主要是表达以下语义内容的动词:能愿、趋向、使令、心理活动、人体器官的动作、文化活动、战争活动、农业生产、经济活动、言语活动等。另有一些代表特定语义范畴的动词,如表给与(给、与)、表存在(有、无、没、在)、表作为(做、为、干、搞)、表判断(系、为、是)、表类似(犹、若、似、如、像)、表遭受(被、蒙、遭、受、挨)等。

6. 形容词。主要是朱德熙(1984,73页)指的性质形容词,特别是单音的性质形容词。朱先生所指的状态形容词可以看作是性质形容词的形态变化形式,因为只有这样看,这两类词才有共性,否则仅凭句法分布,很难把这两种词划作一类。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性质形容词先产生,状态形容词是后派生出来的,这种变化的来源和发展应主要是语法史研究的对象。

7. 叹词。叹词古今存在差别,但就单个词来说,古今对应性较差,可以分类研究。吕叔湘(1982,345页)分为表感叹,如“噫、嘻、噫嘻、呜呼、嗟呼、啊、哟、喂、哎、嗨、哦、哼、喝、哎哟”等;表应答,如“唯、喏、哎、啊”;表招呼,如“喂、嗨、嘿”。

8. 数词。数词中基本的系数词和位数词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可见古今变化不大(王力 1980, 493 页)。数词中有两种词值得研究,一是占位数词的变化,如“有、又、单、零”,二是附在数词后面表示约数的词,如“许、所、余、上下、左右、来、强、把、多”等。

9. 词缀。词缀从语法的角度看不是词,但研究词汇演变问题是需要把它作为词汇单位来看的,因为一方面如刘叔新(1990)所说,词缀作为语法性的结构成分,一般也同时兼有词汇性,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成分;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构词成分,所以它的发展对词汇系统的演变有直接的影响。汉语从古到今大家一致认为是词缀(有的叫词尾)的并不多,但类似词缀作用的单位不少,如吕叔湘(1984, 517 页)曾提出一个“类词缀”的概念,赵元任(1979, 234 页)称为“结合面宽的语素”。从词汇演变研究的角度不妨把词缀划得宽些。如吕先生提到的类前缀有:可、好、难、准、类、亚、次、超、半、单、多、不、无、非、反、自、前、代;类后缀有:员、家、人、民、界、物、品、具、件、子(分子、电子)、种(军种、兵种)、类、别(级别、国别)、度、率、法、学、体(半导体)、质、力、气、性。其中有的构词能力比较强,如“可”,很多动词加上它可以转为形容词,如“可爱、可怜、可喜、可恨、可悲、可恶、可耻、可笑、可恼、可怪、可怕、可惜、可叹、可观、可取、可靠、可嘉、可敬、可口、可行、可疑、可憎”,类似这种单位值得研究。

附注:

- ① 词汇中新词的来源不一定是旧有词汇衍生的结果,

还有从方言和外语中来的,这两种情况不在此节讨论。

② 衍生性演变和交替性演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演变现象,不能混淆,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要把二者区分清楚也并不总是很简单的事,有时会出现争议。如结构助词“的(底)”与古代的“之”和“者”之间是衍生性演变的关系还是交替性演变的关系?吕叔湘(1984,127页)、王力(1980,320页)的意见是前者,吕先生认为“的(底)”来源于“者”,王先生认为来源于“之”。但石毓智(1998)的意见是后者,认为“的(底)”是替代“之”和“者”的同功能成分,但不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而是由指示代词“底”独立发展来的。

③ 如吕叔湘(1985,345页)认为由于“几”在使用上有种种限制,所以才产生了“多少”,按照吕先生的看法,“多少”是代替“几”的。那么古代与“几”共存的“几何”与“几”和“多少”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来解决。

衍生性演变

本节讨论衍生性演变的下位类型问题。这类问题讨论的比较多了,因为其中的内容与下面其他问题的讨论关系密切,所以把一般大家提到的一些类型也放在这里说一说,主要是结合自己的研究谈点看法。

依照新词产生的途径或说依照新词与源词之间的关系,衍生性演变可以分出以下类型:

(一) 词义引申。词义引申是新词产生的最主要的途径。蒋绍愚先生(1989a, 71页)说:“引申是基于联想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词义发展。甲义引申为乙义,两个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意义有相关的部分。从义素分析的角度来说,就是甲乙两义的义素必然有共同的部分。”蒋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有的两个义位之间的引申关系或者说两个义位之间的联系比较明显,凭直觉也能感觉出来。如“驰”本义指“马快跑”,后来词义扩大了,泛指一般的“疾行”。一般地说词义扩大和缩小两种方式中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分析。但词义转移的情况有时就难分析一些。从目前词典中义项排列的情况看,很多义项之间的直接引申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例如“刚”表示“刚刚”(时间副词)的义位是从哪儿演变来的呢?在“刚刚”这个义位产生的时候,“刚”就有“刚强”、“勉强”、“偏偏”、“恰好”、“仅只”等义位,其中哪个义位与“刚刚”的义